

書名：《中國文學史之成立》

作者：陳廣宏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 年 12 月

頁數：445 頁

自上世紀初清廷先後頒布“壬寅學制”和“癸卯學制”，將近代意義上的“中國文學”學科納入本國教育體系以來，“文學史”作為文學教育與學術研究的主要形式，逐漸成為一種為人們所熟知的用來了解和認識文學的知識形態。回望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文學史的建構之路，文學史寫作日臻系統、成熟的同時，也逐漸暴露出諸如思維模式僵化、敘述框架固定等積重難返的問題，已引起當今學界的廣泛關注。“重寫文學史”的命題正是在這種反思與重構的訴求之下被不斷地提出。當然，要實現中國文學史書寫及其教學、研究體系的翻新，還有相當長遠的路要走。評估和檢討已有的文學史書寫經驗，仍是當前很有必要開展的一項工作。上海古籍出版社於 2016 年底推出陳廣宏教授《中國文學史之成立》一書，是近年大陸學界在此領域頗具分量的研究成果。該書將作為詞語與概念的“文學”以及作為知識體系的“文學史”，置於晚清民國時期中西及日本不同知識背景、文化立場的時空坐標之中，又通過對中國傳統學術和西方理論新知的梳理加強其闡釋的縱深，細緻地描繪了這一知識與學術體系形成的歷史脈絡。

一、文學概念與傳統“基因”

從 1904 年作為京師大學堂國文講義的林傳甲《中國文學史》問世，到“五四”以後胡適提倡“文學革命”並推出《白話文學史》，二十世紀初中國的文學史研究範式經歷了從模仿他者到自我建構的轉換過程。考察這一自覺過程及其

所蘊含的複雜因素與諸多細節,正是陳教授這部著作圍繞“成立”一詞所設定的研究目標。除“序章”和“附錄”外,全書分為三編,大致沿著明治日本漢學背景下的中國文學學科建立,清末民初官學改制以來文學史敘述的仿襲與調試,以及“五四”以後中國文學史的自覺和多維建構這三個方面展開論述。

儘管學界圍繞上述幾方面的研討已有了一定數量的成果,但《中國文學史之成立》一書旨在進入文學史現場而進行“更為徵實的考察”,展現出的學術視野和問題意識,仍將對當前的文學史研究提供豐富的學理啓示。如針對近代文學概念轉換的議題,自王國維提出西學以日本為“中間之驛騎”而漸入於中國以來,研究二十世紀早期中國文學史的學者,已能注意在西方文學觀念輸入中國這一側加重筆墨。至於“文學”這個詞語在中國傳統學術體系中如何演變,它被賦予怎樣的社會、文化內涵而成為具備特定指向的概念,以及它如何被確立為英語 *Literature* 的譯名來代表一種知識形態等根源問題,似乎因人們長期以來對“文學”的習慣性認識,反而很少被察覺。從這個層面來說,陳教授在該書序章通過大量篇幅來討論文學概念在中國傳統學術語境中的古今演變,指出要考察文學概念及其研究在近現代的轉變,“不可忽視中國文學及其觀念自身自近世以來所呈現的內在變化”,這種變化又構成近代中西對接的基礎,就顯得尤為重要。

我們知道,所謂近代的“西學東漸”,很大程度上是十九世紀以來中國乃至東亞與西方知識、文化體系對撞與對接的問題,具體呈現為大量的西學詞語及其概念的譯介與引入。對詞語的歷時考察,即以詞語為觀察對象,分析它們被不同的學術、文化所賦予的不同概念,以及同一概念通過不同詞語或不同文本得以呈現的歷史語境,正是概念史研究的核心。陳教授在序章對“文學”一詞及其概念在中國傳統學術體系中的梳理,敏銳地抓住了近代中國文學概念轉換研究的關鍵所在。他指出,一方面中國傳統知識體系中的“文章”一詞,及其與之相類的“文辭(詞)”、“(詞)辭章”、“文藝”等詞語,作為代表傳統四部分類之學中“集部”合集的指稱,可以略與西方分科之學的“文學”相對應。另一方面,如作者在《“古文辭”沿革的文化形態考察》一文中已詳細梳理,“文章”的概念本身並非一成不變,在“文”與“學”分合的動態歷史進程中,“文章”也無法始終和“文學”對等起來。唐宋以降,理學家試圖分“文”、“學”為二途,而古

文家則致力於維繫“文”與“道”的二元關係，並著重提出體道者的“學”，進而構成一種“文”、“學”與“道”相互聯結的知識架構。至清代發展為以義理、考證、文章三者所構成的學術體系，文學成為包含文章在內的廣域概念。日本江戶時期漢文“文學”與歐洲中世紀 Literature 兩個詞語也同樣是涵蓋眾多知識、學問在內的大概念，由此形成了某種為“文學”與 Literature 對譯的共通點，也即作者在序章所總結的，“無論是價值觀念，還是其自身的容量而言，以傳統 Literature 對應傳統‘文學’義，有其本來的可通約性”。這一梳理將幫助我們認清“文學”的西學概念和漢語概念如何實現最初的對接，更進一步地，也有助於我們理解以辨體、源流為核心的傳統文章學為何最終會被“文學史”所取代。

詞語及其跨文化語境下的傳播研究，對於考察近代“西學東漸”背景下，包括“文學”在內的眾多知識形態與話語體系的移植與古今演變，無疑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而要釐清這種移植和演變，誠如著者所言，又不可不重視中國文學自身的“基因”，須“清理並把握我國文史研究的既有積澱及複雜形態”。因此該書序章的價值，不僅在於徹底梳理了“文學”概念的由來，更重要的是，作為近代知識體系研究的範例之一，序章體現的研究思路提醒我們，探討學術史上的近代問題，無論是西學概念的譯介，還是中西、中日之間的文化移植與互動，都應視其為動態的複雜過程，在注重掌握西方和日本學術背景的同時，也不應忽視中國自身學術傳統所提供的豐厚遺產。

二、文學史的動態考察

在系統梳理了清末民初文學概念接引與轉換的歷史語境之後，該書接下來展開的工作，則是檢視文學史書寫如何與日本模式實現對接的過程。如果說，序章從一個較長的時段為我們展示了文學概念在本國學術傳統中的豐富意涵，得益於陳教授多年從事古代文學而具備深厚的古典情懷；那麼作為正文的三編通過對中、日典型文學史案的深入考察，來探索甚至還原“成立”的動態過程，則有賴於著者長期持守的實證研究理念與方法。此種實證考察所營造的歷史“現場感”，有效地彌補了我們對早期中國文學史建構諸多細節的認知

空白。

“動態”是書中反復提及的一個詞語，在著者心目中，無論是中國自身的文學概念，抑或是西方文學資源以及作為中介的日本模式，顯然都不是靜態的研究對象。以此為目標，第一編“明治日本：新舊漢學之間”，主要考察近代國人文學史書寫所借鑒的日本模式及其確立、演進的過程，通過重點分析齋藤木、“赤門文士”、狩野直喜等人的文學史案例，為我們呈現了明治以來中國文學史建構的複雜面貌。伴隨著新舊漢學的嬗變，明治日本的中國文學史建構重心，經歷了以經典為核心的上古文學，到以詩歌、戲曲、小說為中心的近世文學轉向。這一重心偏移所對應的西學背景，則是西方以古典學為核心的模式，轉為文藝復興以來純文學觀念指導下以俗語文學為重心的文學史敘述模式。著者指出，從文學史敘述的架構上來看，相比末松謙澄《支那古文學略史》、兒島獻吉郎《支那文學史》，齋藤木《支那文學史》儘管架構仍側重在上古學術，但已具備一直延續到近世的通代眼光，因而實可視為新舊漢學之間的過渡產物。而以“赤門文士”為代表的新漢學派的文學史敘述，從藤田豐八到笹川種郎、久保天隨的著作，均呈現出文學史觀的更新和敘述立場的變化，其一是將文學從廣域概念的學術中剝離出來而使其成為專門學問，其二是不斷提升戲曲小說等近世文學的地位和比重。到了狩野直喜那裏，此種文學史觀的更新被進一步加強，並伴隨著西方實證主義方法被運用於古典戲曲小說資源的挖掘，中國俗文學研究的新領域逐漸拓展開來。

由此，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早期中國文學史敘述模式的發展路徑，也正是通過藉助這一路徑的串聯，使原本作為獨立研究單元的齋藤木《支那文學史》、狩野直喜《支那小說戲曲史》，成為此編討論的有機構成，避免了個案研究在通篇論述中被割裂和孤立的問題。著者在序章特意標舉的“動態考察”的研究理念，在此得到了很好的貫徹。對研究對象的動態化呈現，固然依賴於著者對文獻材料的整體拿捏和解讀，我們看該書附錄“中國文學史著作編年簡表”，當可了解此種文獻窮盡工作的重要性。更重要的，也源自著者長期從事文史研究而具備的學術立場，即無論是文學現象，還是歷史場景，都不視其為被抽離的孤立事件或被定格的靜止畫面，而是秉持一種嚴格與審慎的態度，掌握史

料,理性辨析,最大限度地去復原當時的具體場景,去呈現研究對象的“變動性”和“整體性”。

就該書第一編而言,著者對日本早期中國文學史敘述“變動性”的把握,已略述如前。至於體現著者宏大視野的“整體性”,可以從貫穿全書的中、西和日本三條綫索加以說明。正如著者在後記中所說明的,該書的前身實際上是課題“文學史敘述的現代轉型:西學知識、日本經驗與本土化進程”的研究成果。而全書所呈現的內容和結構,也確實體現了著者設定研究課題的初衷,即把中、西和日本三者視為一個互動的整體,嘗試從不同的學術文化背景中去把握文學史建構的歷程。因此,我們看到儘管第一編側重講解日本的中國文學史研究,但顯然著者並不滿足於對此作單向梳理,而是有意識地去展示西方和日本、中國和日本之間的對話。著者認為明治日本的漢學是在與國學、西學的張力中得以發展演進的,並指出歐洲的近代史學,尤其是體現新文學史觀的泰納《英國文學史》,對於作為現代人文學術知識體系的中國文學史之建立,具有重要的樣板意義。日本早期文學史著作運用泰納學說的模式,此後又成為中國學界接受西方實證主義的重要來源。該編第二章重點介紹泰納的文學史觀及其對中國早期文學史敘述模式的影響,正可見著者之匠心獨運。

三、進入文本的細部呈現

第二編“清末民初:新知的移植與調試”,即旨在深化上述中、西及日本三者之間的對話,進一步探討中國學界在本國文學史體系初創之際受到外來影響及自我調整的過程。此編論述,雖著眼於林傳甲、黃人和曾毅這三個已為人所熟知的文學史個案,但著者運用他擅長的深入文本、比勘文獻的細部處理手法,細緻呈示三部文學史文本的自身構成及其背後的歷史情境,澄清問題,還原現場,可謂別開生面。如指出林傳甲《中國文學史》雖有意效仿笹川種郎《中國文學史》,但不可忽視此書小注所引日人文典和修辭學著作對林氏的影響。林氏試圖將西方的古典語文學與中國的詞章學進行對接,嘗試運用所接受的西學新知來重新闡釋傳統文學的內容。黃人的《中國文學史》則更進一步,吸

收了嶄新的文學觀念,觸及國別文學史知識體系的內核,因而此著誕生的意義在於顯示出國人的文學史建構在晚清“由外在學科架構進入內核觀念的進展”。對於黃人文學觀念的來源,作者通過文本比勘的方式分析黃人有關“文與文學”的討論與太田善男《文學概論》的關係,進而將論述拓展至明治以來日本的西方文學論研究與十九世紀英國文學批評,由此梳理出黃人文學史接受西方新觀念以及奠定“純文學”新格局的情形。在討論曾毅《中國文學史》的第三章,著者再次展現了這種剖析文本的精湛技藝,將曾氏文學史著作的章節設置、內容敘述,與兒島獻吉郎《支那文學史》互相校核,指出曾氏所著基本是以兒島氏《支那文學史》為藍本加以增刪、改寫而成,又結合其中改動和調整部分的比較,來嘗試解讀曾氏對中國文學史的總體思考和獨到見解。正是通過這樣一種看似瑣碎和枯燥的文本“解密”方法,百年來文學史研究的疑案,即曾氏《中國文學史》的著作權問題得到了很好的澄清。

筆者之所以在此強調上述被陳教授稱之為“校勘式的實證考察”的研究方法,是因為對我們來說,要進入相對陌生的元明清近代的文學世界,貼近文本實際上是一條非常有效並且值得鼓倡的途徑。這種陌生感,客觀上是由於這段時期的文獻資源足夠豐富,總體上降低了我們對研究對象的掌握和熟悉度。而從研究者的主觀意識來說,也因為我們以往習慣了用太多的宏觀論述和印象式判斷,來搭建元明清近代文學史的研究框架。因此,開展近世以來知識的“考古”工作,更需要有深入文獻和處理細節的沉靜心態。只有通過這些細密的基礎考證工作,才有可能讓我們跳脫出積澱已久的陳舊印象和固有認知,去盡量還原研究對象的真實語境與生動面貌。陳教授近年來在這方面已作了諸多有意義的探索,如《從〈詩法要標〉看晚明詩法著作的生產與傳播》、《嚴羽詩學著作的生成及其早期傳播》二文,均注重從考查文本的生成、差異及其複雜性入手,去展現那些不易為人察覺的詩學現象,就是兩個頗為精彩的例證。

四、回望“五四”與重寫文學史

回到最開始重寫文學史的話題,討論二十世紀以來中國文學史研究,“五

四”顯然是一個我們無法繞開的節點。儘管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反思和審視“五四”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但不可否認的是,正是這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事件,開啓了具備現代學科形態的中國文學史之建設。“五四”之後,文學史的書寫和研究開始由仿襲和借鑒轉爲自主整理及建構,如作者在該書第三編“胡適之後:文學史建構的多維拓進”所總結的,進入了一個“自覺受容的階段”。胡適作爲學界自覺反省和自我創建的文化先驅,以其“歷史的文學觀念論”主張,運用西方科學、實證的研究方法來開拓中國新文學的理論體系,規定了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思考和研究文學史的具體指向。如二三十年代的純文學史研究及以鄭振鐸爲代表的俗文學史研究,均可看到胡適所帶來的深遠影響。

時至今日,這種影響恐怕仍在延續,儘管我們對二十世紀初胡適以來的文學史建構已作出了諸多修正甚至超越,但至少從大學的文學史教學來說,其課程內容短期內不會有太大的調整變動,仍然會延續著上世紀既有的框架。而從文學研究來說,二十世紀的模式爲我們帶來了不少成果,但也潛藏著危機,我們似乎仍習慣地以一種審判者的姿態去面對歷史,習慣地以一種他者所設定的評判標準去審視傳統。如按照胡適所謂“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的文學進化觀,以一套似乎天然合理的評判標準將元明清詩文判爲劣等,形成一種認定其價值不如戲曲、小說,其成就無法媲美前代的固定思維。當然,也應看到近幾年這種研究狀況已在慢慢轉變,學界明顯加大了對近世詩文的關注力度,其中蘊含著突破固有文學觀念和研究框架的積極因素。較引人矚目的是以“全明詞”、“全清詞”爲代表的大型文獻整理工作,以系統清理文獻爲基礎,帶動近世詞學研究的迅速展開。而在詩文理論方面,如明清及民國詩話的整理與研究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另外如近十年在大陸學界興起的文體學、文章學研究,從文獻整理、考鏡源流入手,去重新解讀那些古代重要文類的應有價值和地位,同樣值得關注。這方面,長年投身於近世詩文評文獻整理研究的陳教授,自然會有更爲深切的體會。我們從他這本著作細緻梳理“文章”及其知識形態如何被“文學史”所取代的過程,當可以感受到著者隱於字裡行間的現實關懷。

正是這種帶著反思的關懷,孕育著破除積習已久的陳舊模式以及未來重寫文學史的可能。當然,所謂“重寫”,並不意味著對過去作“五四”式的徹底清算和全盤否定。身處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那場轟轟烈烈的文學史“重寫”討論中的學者,也許不會想到,進入新世紀以來,研究者們所開展的工作,從陳國球《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到陳平原《作為學科的文學史》,恰恰更傾向於以冷峻的目光去檢討百年來的文學史研究,以細緻的筆觸去“重現”埋於故紙堆的文學史現象。遠瞻前方,還需回望來路,當近代成為歷史,“五四”成為傳統的延續,我們如何反思已有的文學史書寫經驗,將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未來文學史寫作與研究的走向。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文學史之成立》以審慎、公正的態度來還原近代以來文學史建構的真實語境,顯得尤為可貴。我們也期待並相信會有更多的有識之士,共同投入到這項富有意義的事業中來。

(作者:香港浸會大學孫少文伉儷人文中國研究所副研究員 龔宗傑)